・新聞學研究・　第一六九期
2026 年 10 月　頁 157-171　書　評

平臺權力下數位勞動者的能動性：評介《抵抗演算法》*

劉宜恬**

書　　名：*Algorithms of Resistance: The Everyday Fight against Platform Power*
作　　者：Tiziano Bonini, Emiliano Treré
出版日期：2024
出 版 社：The MIT Press

投稿日期：2026 年 9 月 24 日；通過日期：2026 年 10 月 2 日。

* 感謝鄭宇君老師介紹此書，以及編委會提供的寶貴建議。
** 劉宜恬為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

本文引述格式：
劉宜恬（2026）。〈平臺權力下數位勞動者的能動性：評介《抵抗演算法》〉，《新聞學研究》，169，157-171。https://doi.org/10.30386/ MCR.202610.0018

當我們每日睜開雙眼的瞬間，演算法便開始了它無聲的運轉。從通勤時聽到的串流音樂推薦、午餐時外送員的送餐路線，到社群媒體上滑過的新聞推播，演算法已成為建構當代社會現實的隱形基礎設施。面對這些由科技巨頭所壟斷的數位平臺，學術界與大眾論述往往籠罩在一層深沉的悲觀主義之中。學者 Shoshana Zuboff（2019）提出的「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精準地描繪了一幅反烏托邦的圖景，人類彷彿淪為被動的數據提款機，除行為被持續追蹤外，連未來的選擇都遭到自動化系統的預測與操縱；平臺權力（platform power）被描繪成一種單一、龐大且難以撼動的霸權。然而，義大利西恩納大學學者 Tiziano Bonini 與英國卡迪夫大學學者 Emiliano Treré 於 2024 年出版的《抵抗演算法：對抗平臺權力的日常鬥爭》（*Algorithms of Resistance: The Everyday Fight against Platform Power*），卻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兩位學者並未否認平臺權力的龐大與冷酷，而是將研究目光轉向了全球各地街角與私密聊天室中，那些試圖與演算法周旋、博弈甚至顛覆其邏輯的普通人。

本書的核心關懷，在於重新審視數位勞動（digital labor）與人類能動性（human agency）間的關係。作者引用 Alessandro Gandini 的觀點，將數位勞動細分為社群使用者無償提供的免費勞動，以及低薪零工在無內容媒體（如 Uber、Deliveroo 等）上提供的平臺勞動。面對這些無所不在的數位剝削，作者提出了「演算法能動性」（algorithmic agency）的概念，將其定義為人們運用演算法主動塑造計算結果，以實現自身利益的反射性能力。該視角打破了科技決定論的僵局，指出演算法與人類之間其實是一種象徵的共生關係（symbiotic alliance）；演算法固然牽引著人，但人同樣能對演算法施加影響。

壹、拆解機器的慣習：道德經濟學與能動性的理論矩陣

若欲深入理解人與演算法的共生關係，我們必須跳脫將演算法視為中立工具的傳統思維。本書引用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1984）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作為理論基礎。Giddens 所強調之結構的二元性（duality of structure），意指社會結構既是由人類的能動性所構成，同時也是構成的手段與媒介。將此觀點延伸至數位時代，演算法基礎設施便如同 Giddens 筆下的社會結構，它既限制了使用者的行為，卻也為新的行動提供了可能。Giddens 認為行動者並非無知的，他們擁有一種「實踐意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能夠在日常互動中靈活應對，並具備反思性監控（reflexive monitoring）的能力。當使用者面對演算法時，他們同樣會發展出應對的實踐意識，試圖改變其行為軌跡。

而演算法能動性與人類能動性並非零和博弈。誠如 Renee DiResta（2022）所言，當代社會的資訊傳播已從過去由上而下的製造共識（manufacture of consent）轉變為操縱共識（manipulation of consensus），為演算法、平臺能供性（affordances）與使用者能動性三者複雜交互作用的結果。DiResta 引用麻省理工學院學者 Sinan Aral 的「炒作循環」（hype loop）概念指出，使用者透過行為向機器提供訊號，演算法理解這些訊號並反映在推薦中，人類隨後又對新的刺激做出反應。在此循環中，演算法並非被動的客體，而是循環中必須存在的角色。在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的視角下，能動性不再是人類所獨有的特權，而是分散在人類、演算法、數據與物質之間的分散式能動性（distributed agency）；Louise Amoore（2020）更進一步指出，演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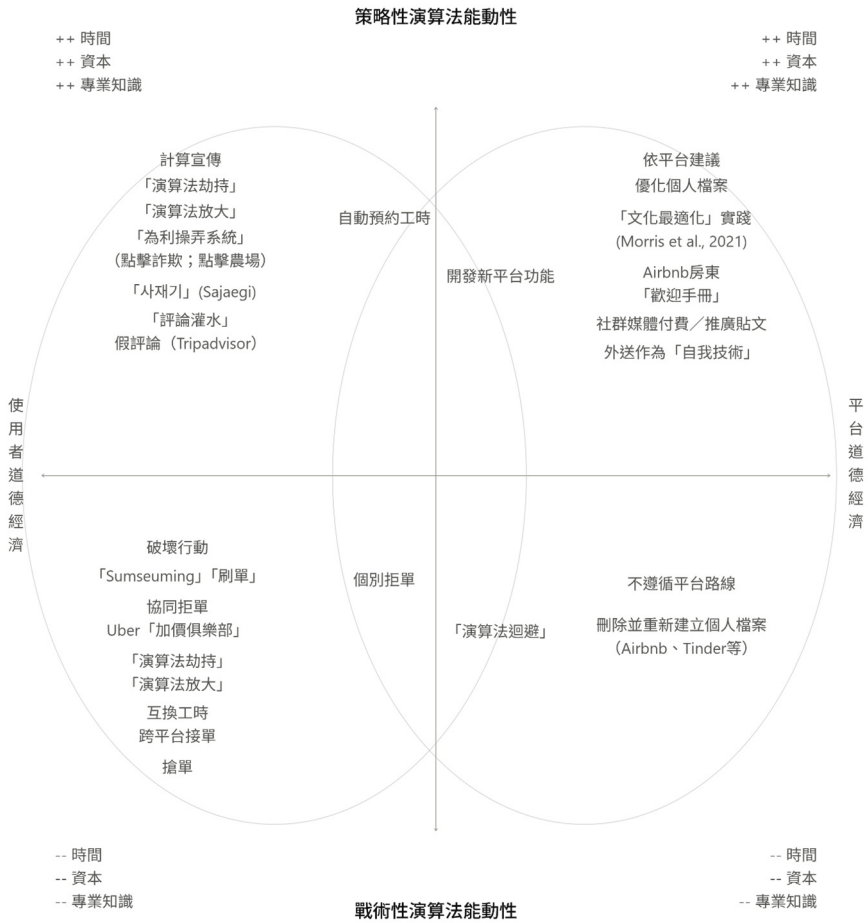
是一種複合式造物（composite creature），人與演算法在運作過程中相互學習、共同組裝。因此，當我們談論抵抗演算法時，面對的並非一部僵死的機器，而是一個會隨著人類抵抗行為動態調整的社會技術生態系統。本書正是一部生動的全球民族誌，記錄了勞動者與行動者如何在這複雜的人機糾纏中，尋找生存與反抗的空間。

為了深入剖析使用者如何在充滿限制的環境中行使能動性，本書在第二章建構了一個極具解釋力的理論矩陣，將「演算法能動性」放置於兩個維度交織而成的光譜中。第一個維度借鑑了歷史學家 Edward P. Thompson 與人類學家 James Scott 的道德經濟學（moral economies）概念。Thompson（1971）在研究十八世紀英國農民的麵包暴動時指出，群眾的抗爭並非出於非理性的貪婪，而是基於他們對合理價格與生存權利的傳統道德認知，其認知與當時新興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邏輯發生了劇烈衝突。

將此概念平移至今日的平臺社會，作者指出演算法的運作場域存在兩種相互競爭的道德經濟：一端為「平臺道德經濟」，深植於新自由主義，推崇自由競爭、個人主義、數據榨取以及看似客觀實則充滿偏見的績效主義；另一端則為「使用者道德經濟」，其行動邏輯可能包含了互助團結、集體抵抗，或是基於基層生存考量的尋租與規避行為。當使用者為了追求更公平的資源分配而採取行動時，在平臺眼中可能是違規的玩弄系統（gaming the system），但在使用者的道德經濟中，卻被視為理性的抵抗或正當的生存手段。第二個維度作者則引入 Michel de Certeau 的空間理論，依據行動者所掌握的時間、資本與專業知識多寡，區分為「策略性」（strategic）與「戰術性」（tactical）行動。策略性行動通常由擁有龐大資源的機構或個人發起，如：政黨花錢在社群媒體投放廣告；而戰術性行動則是缺乏權力者在強者制定的空間中，所採取的短暫、零星、游擊式的應對方式，如：Tinder 使用者為了重新獲

得演算法的曝光紅利，而頻繁刪除並重新發布個人檔案等。為了系統性地梳理全球勞動者、文化消費者與政治行動者的演算法抵抗實踐，本書作者提供了一個具解釋力的理論矩陣（詳見圖 1）。

圖 1：演算法能動性的道德經濟矩陣



資料來源： Algorithms of resistance: The everyday fight against platform power (p. 171), by T. Bonini & E. Treré, 2024,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首先，在符合平臺道德經濟的策略性行動（右上象限）中，行動者擁有充裕的時間、資本與專業知識，其行動目標在於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且手段大致符合平臺的商業邏輯。在文化領域，表現為創作者為了迎合演算法推薦機制而進行的「文化最適化」（cultural optimization）實踐（Morris et al., 2021），例如音樂人刻意將副歌移至歌曲開頭以符合 Spotify 演算法防止跳播的偏好，或是品牌透過購買社群媒體付費推廣貼文以直接獲得演算法能見度。在零工經濟（gig economy）中，部分資源豐富的行動者會利用付費機器人進行自動預約工時，以在排班系統中取得優勢；或是 Airbnb 房東精心製作歡迎手冊，透過教育房客給予五星評價的演算法機制來確保自身的超讚房東地位。此外，外送員將外送作為「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自行記錄數據與日記來提升送餐效率，也是一種不挑戰平臺規則，但試圖在數據化管理中重新掌握自我控制權的策略性實踐。

其次，在不符合平臺道德經濟的策略性行動（左上象限）中，握有龐大資源的機構、政黨或行銷公司，基於自身的道德經濟（如政治霸權或商業暴利）而採取違反平臺規範的行動。在政治場域，國家機器會投入巨資部署網軍進行計算宣傳（computational propaganda），或透過大量機器人帳號發動「演算的劫持」（algorithmic hijacking）與「演算的放大」（algorithmic amplification）。在商業娛樂領域，這類行為體現為點擊詐欺、點擊農場，如在 Tripadvisor 上的假評論灌水，或是韓國流行音樂產業中由經紀公司出資的大規模「買榜」（Sajaegi）行為。種種行動展現了強大的資本力量，目的是從根本上操弄演算邏輯，完全背離了平臺所宣稱的有機互動原則。

此時，在缺乏資源的另一端，不符合平臺道德經濟的戰術性行動（左下象限）是本書著墨最深、也最能展現底層弱勢者生存智慧的場

域。當外送員面臨低廉運費與演算法剝削時，他們會基於互助道德，在私人群組中串聯發起協同拒單，或是組成 Uber 加價俱樂部，透過集體離線達到人為製造的供需失衡，迫使演算法啟動動態加價。為了在夾縫中求生，勞動者發展出私下互換工時、跨平臺接單、搶單，或是中國與印度外送員常見的「刷單」（Shuadan），利用多個手機帳號假扮顧客下單，再自己接單）等游擊戰術。在文化消費領域，K-pop 粉絲日以繼夜的「手動刷榜」（Sumseuming）行為，在粉絲道德經濟中是正當的「愛」的支持，但同樣打破了平臺的自然聆聽邏輯。

最後，在符合平臺道德經濟的戰術性行動（右下象限）中，實踐者同樣缺乏資源，但他們的應對方式並未挑戰平臺根本邏輯，而是在遊戲規則內尋找微小優勢。例如，外送員憑藉在地經驗不遵循平臺導航的路徑而尋找捷徑，本質上仍符合平臺追求效率的目標。交友軟體（Tinder）或租房平臺（Airbnb）的一般使用者為了獲得演算法給予新用戶的流量紅利，會採取刪除原帳號並重新建立個人檔案的戰術。在社運場域，當行動者面臨審查時，會運用「演算法規避」（algorithmic evasion）戰術（如使用符號替代敏感字詞），以極低成本在平臺眼皮底下維持敘事空間。

本書所提出的理論光譜成功破除了玩弄系統單一且扁平的道德指控。然而，如同學者 Siles et al.（2023）所提醒的，我們應採用一種流動性（fluid）的方法來研究演算法與能動性，以突破二元對立的框架。他們借鑑了「摩擦」（friction）的概念，指出能動性充滿了張力，行動者可以同時順從又抵抗演算法。因此，前述的四個象限並非靜態封閉的盒子，而是一個動態演練的取向（dynamically performed orientations）。使用者可能在一天之內，在不同的情境下，於順從與抵抗、戰術與戰略之間不斷游移。

貳、從零工街頭到數位粉絲：微觀抵抗的實踐場域

《抵抗演算法》一書在後續章節當中帶領讀者走入零工經濟與文化產業的真實勞動現場。在第三章中，作者聚焦於印度、中國、墨西哥與歐洲等地的線上外送平臺（如 Swiggy、美團、Deliveroo、Glovo 等）。這些平臺背後都有一個強大的演算法分派引擎，例如 Deliveroo 將其命名為「法蘭克」（Frank）。法蘭克如同一位不知疲倦的隱形工頭，透過手機 GPS 無孔不入地監控著外送員的移動軌跡、送餐速度與顧客評價，並將其轉化為決定其生計的分數與等級。演算法治理透過將勞動過程極度碎片化，使得傳統工會的組織變得異常困難。

當身處如此高度非人化與原子化的環境時，外送員並未坐以待斃，而是發展出了豐富的日常抵抗戰術。在個體層面，他們將日記作為「自我技術」，仔細記錄每一筆訂單的距離與報酬，試圖重新掌握被平臺剝奪的數據控制權；或是在面臨派單減少時，採取前述的「刷單」策略騙取平臺獎勵。更有甚者，當外送員面臨極度飢餓或對平臺感到憤怒時，會採取竊取訂單（order stealing）的行為，作為對剝削的微小報復。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抵抗其實發生於集體層面。外送員透過 WhatsApp、Telegram 或 WeChat 建立私密群組。在不受平臺監控的虛擬空間中，外送員不是平臺上那個永遠面帶微笑、使命必達的服務者，而是會抱怨低廉運費、咒罵演算法的鮮活個體。政治學家 James Scott（1985）將這種現象稱為「隱藏的副本」（hidden transcripts），於掌權者視線之外進行的抵抗論述。私密群組被視為他們進行與演算法一起推理（reasoning with algorithms）的非正式學校。藉由交換各路小道消息，拼湊出對演算法運作邏輯的想像（algorithmic imaginary）。基於想

像，他們組織起集體登出、協同拒單，甚至在義大利米蘭的罷工中進行破壞行動（sabotage），阻撓其他外送員送餐以癱瘓平臺運作。此外，印尼的 Gojek 外送員甚至開發出未經授權的第三方應用程式（tuyul apps），直接挑戰平臺的技術能供性，迫使平臺修改規則。

儘管這些戰術展現了底層勞動者強大的韌性，我們也必須深刻反思其侷限性。外送員在私人群組中建立的往往是一種「創業型團結」（entrepreneurial solidarity）。其團結的本質仍然是為了在平臺的競爭遊戲中生存、優化個人收益，而非從根本上推翻平臺的權力結構。且當外送員為了縮短送餐時間而發明出不遵循平臺導航的捷徑時，人類在街頭累積的在地智慧，最終都可能再次被平臺收編。這種將勞動者的日常實踐轉化為系統最佳化養分的現象，體現了 Massimo Airoldi（2022）提出的「機器慣習」（Machine Habitus）概念。Airoldi 指出，機器學習演算法如同社會行動者，在經歷社會化的過程中，會將人類留下的實踐痕跡（data traces）吸收為供自身學習的數據語境（data contexts）。以前述的外送員為例，他們為了規避系統而創造的捷徑與反抗軌跡，最終反而積累成演算法修正派單邏輯、持續進化的資料庫。如今人機糾纏，抵抗與順從的界線變得異常模糊，平臺的系統性吸納能力（systemic absorption）往往能輕易化解戰術層級的挑戰。

第四章將視角轉向看似光鮮亮麗的文化創意產業。隨著 Instagram、YouTube、TikTok、Spotify 等平臺的崛起，文化生產經歷了深度的平臺化（platformization）。Nieborg & Poell（2018）指出，平臺化改變了文化產業的市場、治理與基礎設施，使得文化產品必須不斷被修改以迎合平臺變現的需求。對於當代的獨立內容創作者而言，才華與努力並非成功的唯一保證，他們必須迎合演算法的胃口，進行永無止境的「可見性勞動」（visibility labour）。傳播學者 Brooke Erin Duffy（2016）即指

出，「理想勞動」（aspirational labor）表面上看似充滿熱情與自由，實際上卻充滿了性別化的無償勞動與極度的不穩定性。面對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ies）支配的世界，失去平臺的曝光度（threat of invisibility）就等同於失去生計的來源。

對於不可見的深層焦慮，促使創作者與粉絲們發展出各式各樣玩弄（gaming）文化的戰術。粉絲為了將心愛的偶像推上排行榜，他們願意日以繼夜地進行數據勞動。例如 K-pop 粉絲所熟知的「Sumseuming」（手動刷榜），利用 VPN 與多重帳號，24 小時不間斷地在 Spotify 上循環播放偶像的歌曲，試圖欺騙平臺的推薦演算法。在粉絲的道德經濟中，這屬於一種純粹出於支持偶像的正當戰術，與娛樂公司花錢買榜（Sajaegi）的資本運作有著道德上的本質差異。

在 Instagram 的網紅生態圈中，微網紅（microinfluencers）面臨著觸及率隨時可能因演算法改版而斷崖式下跌的風險。為此，他們在私下組成了被稱為「互讚團」或「粉絲團」（engagement groups / pods）的封閉互助社群。成員們約定好必須在彼此發布新貼文的短時間內，迅速留下真實且有意義的評論，以騙過 Instagram 判斷內容價值的演算法。為了躲避平臺的自動審查，他們甚至會發展出刪除連結追蹤碼等規避戰術。

有趣的是，內容創作者在社群中交流的，不僅僅是按讚數，還有所謂的「演算法八卦」（algorithmic gossip）用以對抗黑箱機制，他們分享彼此對演算法脾氣的猜測，試圖在迷霧中摸索出一套生存法則。創作者們表面上展演著令人嚮往的真實生活風格，背後卻承受著極大的本真性勞動（authenticity labour）壓力。此時，互讚團便是他們在演算法無情打擊下的救生圈；但可能只是一種脆弱的利益結合，一旦有人未能履行互讚義務，便會立刻遭到群體的驅逐與退追蹤。文化工作者的能動

性，在此被壓縮成了對演算法機制的卑微迎合。

參、演算法政治的雙面刃：計算宣傳與行動主義的對決

如果說零工經濟與文化產業的演算法抵抗關乎個人的生計與夢想，那麼本書第五章所探討的「演算法政治」（algorithmic politics），則直接叩問了當代民主社會的根基。在數位時代，政治敘事的塑造已非傳統媒體的專利，社群平臺的演算法成為了各方勢力爭奪輿論霸權的終極戰場。作者將演算法政治區分為體制內戰略性（institutional / strategic）的演算法政治，以及抗爭性戰術性（contentious / tactical）的演算法行動主義（algorithmic activism）。

作者引用一墨西哥案例，揭露了令人不寒而慄的戰略性操作。國家機器與政治菁英投入巨資，僱用駭客與酸民農場（troll farms），部署數以萬計的政治機器帳號（political bots）進行計算宣傳（computational propaganda）。其中，駭客 Andrés Sepúlveda 表示，他的團隊在 2012 年墨西哥大選中利用機器帳號軍團人為地製造出政治人物廣受歡迎的假象（演算法放大），並對反對派進行監聽與抹黑。此外，國家機器甚至發動演算法劫持，當民眾為了抗議多名學生失蹤案而在 Twitter 上發起 #YaMeCanse 標籤運動時，政府網軍便以包含色情與暴力的無意義海量訊息淹沒該標籤，誘使 Twitter 的反垃圾訊息演算法將其自動封鎖，成功瓦解了網路集結。此種由上而下的數位鎮壓，甚至伴隨著實體的間諜軟體（如 FinFisher）監控，讓抗爭者陷入了深刻的「社群媒體偏執症」（social media paranoia），無時無刻不感覺自己處於演算法的嚴密監視之下，導致許多人刪除帳號、退出平臺。

反觀，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15M / Indignados）則展示了戰術性演

算法行動主義的強大潛力。抗爭者並未因為企業平臺的榨取性質而退縮，反而抱持著極高的技術實用主義（technological pragmatism），深刻理解 Twitter 趨勢演算法偏好新穎性及瞬間高頻互動的邏輯。於是，他們透過內部協作平臺（如 Titanpad）精心策劃全新的標籤，並號召成千上萬的追隨者在同一時間集中發布推文。其演算法放大戰術成功地將抗爭議題推上了全國甚至全球的趨勢榜，迫使傳統主流媒體不得不跟進報導，完成了對媒體議程的逆向設定（displacement）。

面對演算法的審查或劫持，各國的行動主義者也發展出了「演算法規避」（algorithmic evasion）的智慧。例如，當反疫苗群體面臨內容審核時，他們會使用「v@ccine」等符號替代來繞過自動化的關鍵字審查；義大利的極右翼份子則使用數字與符號的密碼組合（dog whistling）來逃避 Twitter 的監控；而在墨西哥，當 #YaMeCanse 被劫持時，抗爭者迅速轉移陣地，迭代出 #YaMeCanse2 等新標籤繼續發聲。種種例子充分說明了，演算法本身具有一種不可知論（agnosticism），它既能成為獨裁者與極右翼民粹主義者散播恐懼的武器，也能被草根進步運動轉化為追求社會正義的揚聲器。

肆、結論與反思

作為一名傳播學研究者，《抵抗演算法》書中那些在世界各角落奮力與演算法搏鬥的故事，帶來了許多學術啟發與共鳴。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它打破了人們對平臺權力的無力感，讓我們看見即使在最不對稱的權力結構中，人類的能動性依然能以一種微觀、戰術性、甚至帶點狡黠的方式綻放，恰恰呼應了作者所引用之 Antonio Gramsci 一生奉行的箴言：「理智的悲觀主義，意志的樂觀主義」（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and optimism of the will, Gramsci, 1977, p. 188）。但我們不能僅停留在對這些微觀抵抗的浪漫化讚美中，必須持續嚴肅叩問，這些建立於民間「演算法想像」之上的日常戰術，真的能撼動平臺資本主義的根基嗎？

由於使用者的反制行為往往基於對黑箱機制的片面揣測，其抗爭效力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書中所述之戰術性抵抗多半是碎片化且高度個人主義的，其目的往往是為了在不公平的系統中爭取個人利益（如網紅互讚、外送員刷單），而非挑戰系統本身的合法性。更殘酷的是，抵抗戰術存在著嚴重的資源與階級不平等。懂得使用自動化外掛、VPN 刷榜或規避審查的行動者，通常已具備一定的技術資本；最邊緣的勞動者，往往連理解自己為何被演算法停權的能力都付之闕如。此外，平臺的數據監控能力具有強大的系統性吸納特質。印尼 Gojek 外送員開發的地下輔助程式，最終反而為平臺提供了免費的研發靈感；勞動者在街頭發明的捷徑漏洞，明日就可能被演算法直接收編以修改剝削系統。微觀戰術如果無法昇華為結構性的對抗，終究只能是平臺資本主義除錯過程中的免費測試員。

這正是本書在結語處留下的未竟之題，也將我們引向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當代課題「演算法素養」（algorithmic literacy）。根據 Chiu et al.（2024）的全面性框架，要與人工智慧時代進行充分溝通，大眾必須具備演算法素養；包含對演算法運作邏輯的基礎認知與知識（awareness and knowledge），更涉及對演算法結果的批判性信任與信心（trust and confidence）、對其應用的欣賞，以及在必要時知道如何採取「演算法迴避」（algorithm avoidance）的實踐能力。

本書中記錄的那些駭客、資深外送員與 15M 抗爭領袖，實際上已在實踐中自我啟蒙了極高的演算法素養。然而，這些知識大多仍以「演算法八卦」的形式封閉在私人群組中，寫入少數人的生存秘笈。我們真正

需要做的，是將那些隱藏在地下社群的反抗智慧，轉化為普及的公民教育，幫助更多使用者識別網路上的操縱性內容或行為，從而恢復我們達成共識的能力。《抵抗演算法》是一部極具洞察力且充滿人文關懷的著作，它提醒我們，面對強大的平臺權力，我們絕非毫無還手之力的自動化機器；但也警示我們，唯有從戰術走向戰略、從微觀抵抗走向集體的演算法素養賦權，這場對抗平臺權力的日常鬥爭，才有可能迎來真正的勝利。

參考書目

Airoldi, M. (2022). *Machine habitus: Toward a sociology of algorithms.* Polity.

Amoore, L. (2020). *Cloud ethics: Algorithms and the attributes of ourselves and others.*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nini, T., & Treré, E. (2024). *Algorithms of resistance: The everyday fight against platform power*. The MIT Press.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14329.001.0001

Chiu, T. K. F., Ahmad, Z., Ismailov, M., & Sanusi, I. T. (2024). What a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and competency?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to support them.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Open*, *6*, Article 100171. https://doi.org/10.1016/j.caeo.2024.100171

DiResta, R. (2022). Algorithms, affordances, and agency. In L. C. Bollinger & G. R. Stone (Eds.), *Social media,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future of our democracy* (pp. 121-1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7621080.003.0008

Duffy, B. E. (2016). The romance of work: Gender and aspirational labour in the digital culture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9*(4), 441-457. https://doi.org/10.1177/1367877915572186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ramsci, A. (1977).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J. Mathews, Trans.; Q. Hoare, Ed.; Vol. 1). Lawrence and Wishart.

Morris, J. W., Prey, R., & Nieborg, D. B. (2021). Engineering culture: Logics of optimization in music, games, and apps.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21*(2), 161-175. https://doi.org/10.1080/15358593.2021.1934522

Nieborg, D. B., & Poell, T. (2018).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eorizing the contingent cultural commodity. *New Media & Society*, *20*(11), 4275-4292.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8769694
Scott, J.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jstor.org/stable/j.ctt1nq836
Siles, I., Gómez-Cruz, E., & Ricaurte, P. (2023). Fluid agency in relation to algorithms: Tensions, mediations, and transversalities.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30*(3), 1025-1040. https://doi.org/10.1177/13548565231174586
Thompson, E. P. (1971).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 Present*, *50*(1), 76-136. https://doi.org/10.1093/past/50.1.76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PublicAffairs.